

學術對談

「教授沒有開的課」—— 誰來告訴研究生
該如何做研究？¹



上排 (由左至右)：陳炳宏、王馨儀、劉忠博
中排 (由左至右)：馬匯瑩、張錦華、張國良
下排 (由左至右)：馬成龍、羅世宏、張美鳳

中華傳播學會2007年的年會於7月5-7日在台灣淡江大學舉行，期內以「教授沒有開的課」為題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研討會，結果引來滿場好奇的師生，觸發了熱烈的討論。雖然這門課沒有開，甚至將來也不會開，但內容卻是研究生所渴望知道的，因為他們皆想知道研究的竅門。有感於研究生是研究隊伍的生力軍，他們的問題也就是研究社群的問題，我們乃萌生把當天的討論變為本刊對談的主題，好讓多些同學和老師從中受益。當天參與對談的包括台灣大學張錦華、中正大學羅世宏和台灣師範大學陳炳宏教授，以及世新大學王馨儀和政治大學劉忠博同學。後來以筆談方式加入對談的包括上海交通大學張國良和香港浸會大學馬成龍教授及復旦大學馬匯瑩和香港浸會大學張美鳳同學。對談獲得張錦華教授出任主持，同時得到各與談者的支持，謹此致謝。

¹ 研究生學術承傳對談小組：張錦華、陳韜文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四期(2007)

張錦華：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曾任該所所長。研究專長包括大眾傳播理論、傳媒批判理論、質化研究方法、多元文化主義與族群傳播研究和女性主義與媒介批評。著作包括《傳媒批判理論》等。曾任中華傳播學會理事長。電郵：cchwa@ntu.edu.tw

王馨儀：1979年生於台灣台北。曾被理論震撼、嚐過知識的甘美。譯有《電影雜貨舖》《克理威廉》(校園)。現正進行「台灣憂鬱症論述的系譜」碩士論文。電郵：believe0529@hotmail.com

馬匯瑩：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輿論與傳媒、把關人研究以及大陸與港澳台的跨文化傳播。與他人合作發表論文：《傳媒在兩岸政黨溝通中的角色審視》、《輿論引導方式，期待創新》等。電郵：huiyingma@gmail.com

張美鳳：現為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興趣為媒介生產與媒介效果，以及傳媒教育研究。電郵：04416139@hkbu.edu.hk

劉忠博：曾任台灣立報專題記者，現為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博士生、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志工及駐站作家。電郵：95451502@nccu.edu.tw

羅世宏：倫敦政經學院媒體傳播博士，現為台灣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兼任台灣媒體改造學社召集人。學術興趣廣泛，包括媒體政策、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理論等領域。電郵：shihhung.lo@gmail.com

陳炳宏：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大眾傳播博士，曾任職平面與電子媒體六年，研究興趣包括傳播產業分析、媒體經營管理、新聞採寫實務、傳播政治經濟分析、跨國媒體集團等，出版「傳播產業研究」與「解/構媒體」兩書。電郵：pxc24@ntnu.edu.tw

張國良：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教授、院長，博士(復旦大學與早稻田大學聯合培養)，中國傳播學會首任會長。專長包括傳播學理論與實

「教授沒有開的課」——誰來告訴研究生該如何做研究？

證研究。兼職包括《亞洲傳播季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編委，香港《傳播與社會學刊》學術顧問、《中國傳播學刊》編輯顧問等。榮譽包括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國務院「有突出貢獻專家」等。電郵：glzhang5414@263.net

馬成龍：佛羅里達大學傳播學博士，曾在加拿大及美國任教15年。2003–2007年擔任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研究所事務主席。現為香港浸會大學傳播系教授兼系主任。曾獲得美國國家傳播學會(NCA)跨文化傳播組1997年「最佳出版論文」獎。電郵：ringoma@hkbu.edu.hk

張錦華(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寫作論文是絕大多數研究者的惡夢，對於初入學術殿堂的研究生尤其如此。雖然學術研究有一定的格式，或是外顯知識(explicit knowledge)，需要正式的學習和訓練，但是它絕非機械式的填空，而是一個漫長的創造過程。因此，其中有很多技能，其實是屬於Michael Polanyi 所說的隱微知識(tacit knowledge)，這種知識或能力很難捕捉、歸類、或表達，就像如何寫好一篇小說、詩歌、或新聞，老師往往在教授有限的外顯知識後，就只好雙手一攤，告訴大家要「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學生總是不太滿意這樣的答案吧。今年在台北舉行的中華傳播學會年會提供了一個很有趣的專題：「教授沒有開的課——誰來告訴研究生該如何做研究？」是由剛拿到博士學位，之前是台灣知名的資深記者林照真老師籌組的，邀請了來自世新大學的碩士班的王馨儀和政治大學博士班的劉忠博兩位同學提出問題，由台灣師範大學的陳炳宏及中正大學的羅世宏兩位元老老師提供回應；並邀請我當主持人。由於我在研究所教授質性研究方法多年，每年審查各類研究案往往達數十件以上，確實也有很多感觸，因此欣然同意。

當天在場的有香港《傳播與社會學刊》的主編陳韜文教授，他覺得這是一場難得的促進研究生和老師互動的座談，因此，希望將這場座談的內容作為學刊的專題對談。但他希望在範圍上能擴大為兩岸三地的交流，因此，陳主編又幫忙再邀請了香港浸會大學的博士生張美鳳和復旦大學的博士生馬匯瑩，以及香港浸會大學的馬成龍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學的張國良教授加入對談。

謝謝四位同學和四位老師都很樂意的提供了書面資料。總結來看，同學提出的問題主要是環繞在研究的過程和苦惱(如何找到一個有意義的題目？或是蒐集有用的文獻？如何寫作符合格式的論文？等等)以及與指導老師互動(期待指導老師給予何種指導？具備何種知識？)。而四位老師也分別提供了各種具體的、原則的、或者甚至帶有哲學意味的討論，努力的想把這些隱微知識，加以概念化和類型化，成為研究過程中的外顯知識。這樣的努力很貼心，很用心，相信各位可以細細體會。

王馨儀(世新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生)

經過層層考驗和面談進入了研究所，曾經我們都喜孜孜地期待吸收知識殿堂所擺設的知識饗宴；但是這道知識饗宴就如同正式西餐，各種繁複的禮儀、餐具、吃法，使得我們的胃口逐漸變差，甚至寫完碩士論文就倒盡學術胃口，拿到碩士之後便再也不提研究這檔事。究竟是甚麼障礙讓我們無法輕鬆大啖知識饗宴、徜徉研究天地呢？下面我將循著論文架構分享研究生的研究難題。

研究生普遍的研究難題就是找不到研究主題。從生活經驗而來的研究主題，做起來有熱情，但是由此發想的研究問題也易流於現象面，缺乏問題意識。比方說，有不少人對倒扁事件這個大議題感興趣，但卻只能反覆陳述事件的表面而提不出值得研究的問題。面對此一狀況，我的經驗是先閱讀相關資料，讀的時候可能覺得像在書海撈針，但是在閱讀和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有助於找到核心的關懷；或者也可能因此發現自己沒有能力研究那個議題，快快死了心、換個方向，也是一種另類的收穫。

讀到這裡或許你會納悶地提問：為甚麼不去找老師談？事實上，在問題意識未形成前，老師不知道學生要問甚麼問題，他所具備的專業知識和理論觀點就像沒有靶的箭，實在難以發揮。就學生而言，這個階段所提的問題都不深入，很容易被誤認為沒做功課，致使很多學生選擇孤軍奮戰，但是這個階段卻又最需要老師指點迷津。因此，在問題聚焦的過程中，若能有良好的提問技巧促進師生之間的互動，使老師能發揮其經驗和敏銳度，提示我們該現象有哪些議題值得探討，或許能改善研究起步的瓶頸。

另一個關於研究主題的疑問是，如何判斷選定的題目是否值得研究？判斷的標準到底在哪裡？有同學的經驗告訴我，老師不贊成他的研究題目，原因是他要研究的現象不熱門、乏人問津。也有老師認為研究文本不具代表性，而將整個研究計劃給推翻。老師評估研究價值的標準，是我們研究生較難掌握的，也使得研究主題的確定增添一層困難。

確立題目後，就要尋找適合的理論。傳播領域的研究主題很容易跨領域，這會造成研究過程中幾個瓶頸，像是跨領域如何入門；使用跨領

域的理論，如何確認自己沒有誤用；跨領域而導致文獻回顧無邊無際地寫不停……等情形。找到理論後，下一步就是確立研究方法。其實研究方法有很多種，但是傳播領域的學生論文常局限在調查法、內容分析法、文本分析或訪談法這幾種，像早期一些西方學者還會使用參與觀察和實驗法，但是找不到太多研究成果做為範例，也讓研究生沒有勇氣挑戰。甚至還有人修改研究問題來配合較常用的研究方法，以求心安，造成研究方法反過來限制研究生發想研究問題。

寫研究結論時，原本引用的理論架構無法充分解釋所分析的結果，就必須再引用其他理論，最後結論就變成一篇理論大雜燴。面對這樣的研究結論，研究生會感到相當心虛，而疑心是否起初就使用了不當的理論而導致這般研究結論。其實整個研究過程都脫離不了論文寫作，研究生在研究起步階段，不熟悉論文格式和下筆的語氣，無法掌握學術寫作的用語和文風，也是研究過程中的一大困擾。更甚者，學習研究方法也像是在學習一種產製論文的技術。研究問題、問題意識、研究分析等等步驟，都被支解拆開，質化和量化也分成兩種課程。其實研究除了技術面，更重要的是觀看事情的角度。若能確立研究者的本體論及認識論，方法論自然就應運而生，並且要帶著研究主題來學習，更能刺激學習成效。

條列了上述種種研究過程的難題，這道知識饗宴似乎相當難以下嚥。但是，若不要把做研究、寫論文當作一門必修課、苦差事，而是學著以嚴謹深入的方式，再次認識自己、重新觀看世界，並且進一步解答心中疑問、找尋意義的過程。也期望藉此文拋磚引玉，引發同學們提出研究上的疑惑和困境，與師長們有更多互動，進臻更佳的學習情境。

馬匯瑩(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

對於有志於學術研究的同學來說，都希望把博士論文能夠開掘到一定的深度。這與自己提出的問題有關，而如何找到一個有價值的問題，或者如何在一堆問題中理出頭緒、層次和關聯，找到那個最有研究價值的問題，這是很多同學一開始準備學位論文時最大的困惑。

在準備資料的階段，很多人會看大量的資料。各種各樣的觀點、材料紛呈，有的與自己的研究問題很近，有的雖然相關但卻有一定距離。為了有更豐富的視野，在剛開始會甚麼都看，唯恐有所疏漏，到後來就發現在一大堆材料中「找不到」自己的那個核心問題了，甚至自己原有的判斷或者假設都開始模糊了，每個材料似乎都有關，又似乎都不能直接回答。如何搜集和處理這些大量的材料？這是一項基本功，可是很多人是自己在摸索，那麼它也有規律和方法嗎？

與第二個問題相關，是關於英文文獻。對於漢語文獻，尚可以迅速判斷、鑒別其對於自己的價值，對於英語文獻，則常常事倍功半。無論是電子資料庫資源，還是印刷出版物資源，如何有效率地找到並鑒別與自己研究議題相關的英語文獻，借此體會國際研究者的視野和旨趣？

在學習和研究中，經常發現一些社會很關注、自己也很有興趣的熱點問題，但這些似乎是一些「中國式的問題」或者說「有中國特色的問題」，比如大陸媒介的屬性問題、大陸的黨報現象與未來發展問題、大陸傳媒的監督功能問題等，如何對這些中國傳媒面對的問題深入研究？如何在這些「中國式問題」中找到與國際研究者能夠形成對話和交流的研究點呢？

由於研究傳統、教學體系的不一樣，一些大陸同學缺乏嚴謹的邏輯思維訓練，在平時的學習中如何訓練自己的邏輯思維？

用實證研究方法進行研究，需要一定的實際操作經驗。指導教師能否以自己做過的一些研究為例，講講一些學術研究成果是如何獲得的？比如：自己最先開始的想法、如何設計研究方法，這些方法在實際應用時遇到的一些問題和注意事項，如何調整與更改，又如何形成觀點並撰寫文章？以及使用同種方法的其他研究者是如何開展工作的？有條件的話，可以指導同學做一些這樣的研究項目，並培養研究小組成員分工和協作的團隊精神。

新聞傳播學科與其他社會科學聯繫緊密，在平時的課程中是否可以多介紹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們討論較多的學術話題、前沿問題和研究方法，以拓寬同學們的視野。

老師們是以哪些評價標準來評判一篇博士論文的品質？這些標準與平時發表的學術論文評價標準一樣嗎？如果有區別的話，有哪些不同？

整體而言，寫作一篇博士論文與寫作一篇普通學術文章相比，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總起來說，我希望這些課程或方面能夠得到重視：實證研究方法、統計學、社會科學前沿、文獻檢索、研究專案實例分析。

張美鳳(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博士生)

為了更能反映本院研究生同學的經歷和意見，除了自身的觀察和體會之外，我訪問了另外兩位同學，希望透過提出綜合的意見，有助大家瞭解我們在準備和撰寫畢業論文時面對的問題和挑戰。

目前本院提供的課程中，適合研究生級別的課程有些不足，此外，同學們在研究的實踐訓練方面也較為不足，往往忽略了一些實際操作上的困難和重要事項，一旦出錯，對論文影響很大。

同學們大多希望自己的導師給予具體的指導，但是這樣的期望未必常能達到，一方面是因為老師們都很忙，另一方面是因為同學的研究題目和研究方法未必是導師完全通曉的。其實，同學對此是理解的，但有時在困難重重的研究路上，難免會對指路人有較大的期望。

我們認為研究生要完成一篇高質量的畢業論文，其中一個關鍵在於他/她是否具備嚴格的學術訓練，我們期望的學術訓練包括了五個層面，分別是知識、評鑑、思考、研究和寫作。

在學術知識方面，理想當然是要能博而要能精，但是，由於每位研究生的研究方向都有很大差別，本院學生人數又少，適合研究生級別的專門課程不多，有時未必能切合個別學生的情況，有時同學在修讀完數個課程後，仍然深覺學養不足，往往出現信心危機。

學術評鑑是指對學術作品包括書籍、期刊和論文的欣賞和評價，評鑑的能力在於同學們的學術視野和品味，現時的課程常常侷限於理論課本或學術書籍，較少關注最新的學術研究發展。

將一個社會現象上升到理論層次需要理論思考的訓練，在理論方面，我們比較缺乏宏觀視角的訓練，理論課程大多探討個別理論，較少涉及theory paradigm和meta-theory。我們希望課程能「授人以漁」，幫助同學形成梳理和探索理論的工具和視野。

在學術研究訓練方面，現時的課程大多集中在量化方法上，教授質化研究的課程較欠缺。此外，在課堂上，方法的教授重於方法的實踐和應用。

論文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靠的是同學在學術寫作方面的能力，一位同學的導師曾說過：「別把好的內容寫壞了」，目前同學多靠臨摹期刊以及他人論文來學習寫作的規範，沒有太多系統性的訓練，學校提供的論文寫作課程雖然可補不足，但課程並未為同學提供足夠的實踐機會。

劉忠博(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生)

無論我們關心的是好萊塢電影、韓劇或媒體改革，我們總是把這些議題當成是我們的「研究對象」，然後，再從這個社會中，蒐集有關這些研究對象的材料，例如某些數據、資料、報紙新聞等等。

最好的情況是，我們將這些參考資料全部蒐集齊全，但是，就算參考資料都找齊，我們其實還是會擔心資料會出錯、或是這些資料是否能解釋我們的研究對象。此時，老師總是在旁點醒我們，「要注意你的研究問題呀」、「問題意識不夠清楚」等等。老師提出來的這些問題，當然都是非常重要。不過，老師似乎沒有跟我們說，叫我們去選擇自己最熟悉、沒有人能比我們自己還熟悉的「研究對象」，來加以研究。而這個研究對象，就是我們自己本身。老師最多只是跟我們說，叫我們選擇自己有興趣的題目，最多就是如此。

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在其《夢的解析》之中，給了我們一些線索。研究夢是個非常有趣的例子，假設我們現在要研究夢，那麼該如何進行？

佛氏的方法是，每天早上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昨晚做的夢，趕緊記錄下來，然後對自己的夢，進行嚴格的分析。這整個的過程，就是先把自己給「對象化」之後，再對自己進行分析。簡言之，自己變成了自己所要分析的對象。

談到這裡，我們並不是在說，要完全按照心裡學或佛洛伊德的方式，來進行研究。我們認為，可以學習佛氏的思考方式、學習他到底怎麼樣在想一件事情。

自己為甚麼要念傳播研究所、為甚麼聽古典樂、為甚麼喜歡楊德昌，以上這些問題，對自己來說都可能是最熟悉的材料，但是，我們為甚麼不用這些對自己是最熟悉的材料，來研究自己？我們真的能對自己的行動一目了然嗎？這個問題，不妨問問自己。

那你會問，能解釋自己的行動，就可以解釋其他人了嗎？事實上，作為一名研究生，我們其實也是身處在這個社會當中，社會上發生的事情，會作用到別人，同樣也會作用到自己，社會學界稱這個作用叫做反身性(reflexivity)。能夠解釋自己的行動，我們就能夠用同樣的思考方法來解釋其他人。如果我們再把「研究對象」的概念繼續延伸下去談，亦即，從解釋我們自己的行動出發，進一步解釋其他與我們自己行動有關的行動，比方說自己喜歡某個類型的電影，所以也研究那些喜歡該類型電影的人，而這個整個過程，就是經由解剖自己的行動開始(這是第一個步驟)，再解析其他人的行動(這是第二個步驟)，因此，研究對象必須從自己開始延伸出去，而這個整個過程實際上有兩個步驟。

如果大家都同意第一個步驟的重要性的話，接著，我們可以來討論理論和方法如何構連的問題。先總結以上所談的：我們必須先從剖析自己開始，再去剖析別人。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是先檢視自己發生過哪些事情，再去進行研究。例如，一定是自己先喜歡看星光幫、先喜歡聽巴哈、先喜歡看楊德昌，才會以這些經驗材料，進行研究。

可是現在台灣很有趣的情形在於，研究生好像都不在乎這些已經先發生過的事情，就轉而直接就跳到理論的層次，埋首書堆去熟稔很多理論，爾後再從這些理論當中，尋找有沒有可以解釋自己的研究題目。

我想，如果大家都同意我們剛才談的第一個步驟的重要性的話，就會認為這整個情形，應該是要倒過來進行的。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先檢視發生了些甚麼事情，再去看看有哪些理論能夠解釋我們自己所發生的事。在此，請容許我們進行一種結構性的類比：我們在解釋自己的時候，需要先理解自己發生過哪些事情，再回過頭來去找理論的解釋，那麼，在對其他人進行解釋的時候，又何嘗不是如此？

很多老師都有意識到學生唸理論的問題，大部分都只是在印證那個理論而已。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而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追溯到研究生都沒有對自己進行一種——我們剛才所提到的——自我的剖析和解

「教授沒有開的課」——誰來告訴研究生該如何做研究？

釋。也就是說，先把自己當成研究對象，對自己進行分析，再去分析別人。研究生直接去唸一些別人的理論，而不管這個理論到底與自己有甚麼關連，就好像我們都不會先對自己進行剖析，就去解釋其他人一樣，這兩者的邏輯是一樣的。

總之，如何重建第一個步驟的重要性，我想是整個學術社群可以思考的方向。或許，在研究方法的課程裡，建議可以開設學習「如何解釋自己的行動」的課程內容。

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研究生的階段，有不少人在焦慮、迷惑中度日：不知如何做研究者有之，無法發現或享受做研究樂趣者有之，不知所為何來甚至不想做研究者有之。「教授沒有開的課」——誰來告訴研究生該如何做研究？

建立研究主權：回歸獨立研究的本質

其實，老師的責任在問而不在答，至少應該是寓問於答。由於無法與提問的同學們進行面對面、有機的互動，請容許我還是從嘗試回應王馨儀、劉忠博、馬匯瑩和張美鳳同學的問題著手，但千萬別以為我是以老師的身份與姿態為學生解答。

幾位同學都提到的一個共同問題：找不到具有研究價值的題目，或是無法形成清楚的問題意識，更困惑於其中的判斷標準模糊。這是很重要的提問，我就從回應這個問題開始。

我認為，老師的責任在提問題，更甚於是給答案。我自己不曾粗暴地判斷同學的研究構想是否有價值，問題意識是否夠清楚；相反地，我希望同學和我分享(並且說服我)，為甚麼他(或她)的研究問題有價值？問題意識是甚麼？又，這樣的問題意識為甚麼重要？

換句話說，同學不該期待老師代替自己來下判斷或直接給答案。能夠下這個判斷和給答案的，只有同學自己。研究生自己，特別是博士班同學，不能等待「誰來告訴研究生該如何做研究？」而應自己修練這門「教授沒有開的課」，建立研究主權，回歸獨立研究的本質。

獨立研究是自我發現與自我說服的過程。在確立研究主題與問題意

識的過程中，研究者需要不斷地咀嚼文獻、觀察現象與驗證資料，從中判斷這項研究對特定研究領域或學術社群是否有貢獻，對自己和社會是否有意義。若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這項研究至少具有最起碼的研究價值，問題意識也會從研究者的心靈獨白和自我詰問過程中逐漸得到廓清。

心靈獨白是認識研究者自身的興趣、潛力與限制，自我詰問則是劉忠博同學提到的反身性(reflexivity)的重要過程。劉忠博強調研究者自剖，從解釋自己的行動開始，再延伸到解釋他人、社會。而我在此處所強調的反身性，則是鼓勵研究者嘗試將自身的經驗和觀點去中心化，從而開啟認識與理解更多經驗和觀點的可能性。

比方說，研究生可能挑選自己熟悉或感興趣的題目做，若能做自己既熟悉又感興趣的題目自然是最理想的。前者與生命經驗有關，後者與知識旨趣有關，唯有透過心靈獨白和自我詰問，才能找到結合生命經驗與知識旨趣的題目。

這個過程需要時間，有的人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但快慢本身不是問題。

研究是創意，更是勞動

不過，找到題目和釐清問題意識，並不保證可以成功完成一項研究，更不保證研究產出的品質。已故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自述寫作經驗時談到，「勞工，我很感興趣，但還不知道如何下筆。感興趣是一回事，使其躍然紙上是另一回事。」的確，這是任何研究者(不只是研究生)都需要突破的障礙。這個障礙一部份是心理的，一部份是物理的：前者發生在例如研究生讀過文獻也有經驗資料在手，但就是沒有信心下筆的情況；後者則關乎研究紀律與寫作勞動。

雖然我曾在《傳播研究簡訊》中談到這方面的問題，由於它實在太重要了，因此我願意不厭其煩地在此再次強調(羅世宏，2005: 6-7)：

創意不是點子發想而已。天馬行空的發想，無濟於事。寫作的勞動過程，才是創意生發的實際過程。Green (1999: 201) 謂「研究乃透過寫作過程發生」，研究並非「做完」之後再「寫出來」。寫作，很少是一氣呵成，養成「每天寫一點」的習慣極為重要，經過不斷修整、補遺……的過程，

研究產出始有所成。這個過程很難速成，一定量的時間投入，是免不了的。

我偶爾腦海中會浮現「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的意象。「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這句用來形容前輩作家鍾理和的話，我覺得也很適合借用來描述研究的專心致志的狀態，可比吐絲春蠶、成灰蠟炬。沒有用（盡）力氣寫作的東西，難成擲地有聲之作。

同樣地，有句話我從某一部外國電影看來的，意思大概是這樣：「先用膽子寫，再用腦子改」。這句話我覺得很有道理，因為如果一開始就畏縮不敢大膽寫作，再好的研究創意可能會原地打轉，很難有較具體的發展。寫作會磨利研究創意，也是檢驗我們對該研究創意是否仍保持熱情的溫度計。既然學術研究的寫作，比較不像是文思泉湧、一氣呵成的過程，而是歷經一步一腳印、一鋤一犁披荊斬棘而來，研究的學思與寫作過程既無捷徑也一點都馬虎不得。

Sontag自述寫作要領的三字訣，「寫，讀，改寫」。我非常同意，改寫確實非常重要。在英國唸書時，有機會親聆當時校長Anthony Giddens在講座上用「磨利」（polish）一詞勉勵後輩學子。「磨利」在此不是「臨陣磨槍，不利也光」的意思，而是比較近於「日日勤拂拭」的勞動，意指改寫論文就像是擦神燈一樣，只有透過擦拭，不起眼的舊油燈才會變成神奇魔力的神燈。越擦越亮，越磨越利。嚴格說，論文可能沒有「寫完」的時候，永遠都可以再改寫成更好的狀態。

研究需要大量閱讀

同樣地，做研究的過程需要不斷的閱讀，大量的閱讀。閱讀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也是與學術社群對話的學習機會，更是研究活動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一環。

然而，曾聽一些老師抱怨現在的研究生很少讀書，特別是很少直接閱讀英文資料。我認為閱讀英文資料多寡，讀的是一手或二手文獻，可能都不算甚麼大問題，真正的問題是速食、代理式的閱讀，還有研究前期的只讀不寫，以及研究後期的只寫不讀。

所謂速食、代理式的閱讀，意謂研究生大面積的參考他人整理的文獻回顧，並且以大同小異的方式組織、呈現和詮釋相同的文獻，甚至出

現同樣的資料引用錯誤(例如引用資料的數值或頁碼錯誤)，或是出現同樣的理論誤讀和概念誤用的狀況，或甚至出現不可原諒的抄襲其他的碩博士論文的狀況。結果是，同樣的論文被一本一本的寫出來，但研究貢獻和學術意義卻有限，只能說是more of the same，甚至是平庸複製平庸。因此，我希望研究生重新認真看待閱讀這件事，把它看作是研究活動本身的一部份，避免速食、他人代勞式的閱讀，跨越時空距離與前人及同時代的一流研究者對話，並且把握取法乎上的機會。

若是認真對待閱讀這件事，把它看作是研究活動本身的一部份，研究生還需提醒自己做到眼手並用，讀和寫同步進行，而不能流於只消費(單純閱讀)而不生產(寫作)；同理，也不能只寫不讀。

很多研究生以為閱讀是研究前期做的事，而寫作是研究後期做的事。我認為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正如前引英國學者Michael Green的說法，研究並不是做完後再開始寫作，而是透過寫作過程發生；因此，寫作在研究前期即已開展。同樣地，閱讀也不是在研究進入資料蒐集、分析階段之後就不需要了，閱讀活動貫穿整個研究過程，除了繼續閱讀/重讀相關文獻之外，包括(批判式)閱讀自己已經寫作完成的內容。

勇敢做研究，回歸基本功

本文一開始我強調獨立研究，建立研究主權，跳脫等著教授教導怎麼做研究、研究甚麼的心態。但這不意謂不必和教授互動，向教授學習，更不意謂隨性所之，廢弛作為一個研究生最基本的要求。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研究所是獨立研究者養成教育，「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研究這門功課，既不好學，也不好教，緊密互動、教學相長的「師徒制」，言教身教兼而有之，或許是較為理想的獨立研究者養成教育。然而，當前在碩士班，甚至博士班都開始越來越走上量產模式，教授開的課與研究生修的課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或許真正需要的不在於更多課堂上的教與學，而是更多回歸心靈獨白、自我詰問，以及緊密互動、教學相長與言教身教兼而有之的師徒關係。

同樣地，國際傳播學會(ICA)最近的一項名為「如何變成教授」(“How to become a professor”)的研究，針對五十二所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的調查指出(Han & Gendelman, 2007)，影響傳播研究生在學術界成功或失敗

的典型特徵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動機方面的，包括自主性和開創性、投入研究的熱情、求知動機、工作紀律、學術上的正直誠信。其次才是技能方面的，包括研究方法的訓練和能力、寫作技巧及時間管理，以及吸收和產出資訊的能力……等等。

以上寥寥數語，可能無法有效地回應(遑論解答)王馨儀等四位研究生提出的問題，但在篇幅限制之下，我希望還是可以把握這個機會，對所有曾經(或正在)徬徨失落、焦慮困頓的研究生說：「別怕，勇敢的走自己的研究路」。

陳炳宏(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針對研究生在撰寫論文過程中普遍面對的困境與問題，我想提出幾點淺見，希望可以提供正陷入論文書寫困境，或害怕即將陷入困境的研究生作參酌。

掌握研究主權

請務必記住寫論文是研究生的責任，也是取得學位的必要條件之一，千萬不能也不要冀望老師會給你題目，或者期待指導教授能全權掌控，你只要聽口令做動作即可，這些都是錯誤的期待。我不否認，有些老師喜歡給同學題目，也喜歡同學聽命行事，或許這樣可以皆大歡喜，同學不用花太多心思在找題目，老師也可以有充分的主導權，避免浪費研究生與老師太多無謂的摸索時間。不過我想相對於喜歡給題目的老師，期待老師給題目的同學反而更多吧！請大家記住，寫論文是研究生自己的事，無論是從題目發想、到資料蒐集、到研究架構擬訂，都應該是由研究生來掌控，指導教授只是從旁協助，根據其研究經驗，指正研究生從題目發想與研究建構等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錯誤偏向而已。

所以論文題目應該要自己想，資料要自己找，研究架構要自己先試擬，研究方法要自己先構思。進行論文中不要過度依賴指導教授，這不是因為指導老師太忙或無心指導而推責，而是因為這些原本就是一個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必須承擔的責任，否則就不能說是自己產出的研究，也無法建立研究本身的特殊性，更遑論這研究對研究者的價值與意義啊！

善用關鍵字

前面我說過，研究生在進行論文時必須建立自己研究的主權，而這主權的建構則是從尋找題目開始。先精讀幾篇自己有興趣並可能成為研究議題的相關文獻，接著透過這些研究資料整理出一些關鍵字，然後利用這些關鍵字在各式各樣的中英文資料庫中，去查詢其他更多可能與你研究旨趣相似的研究理論概念與文獻資料。

在找到更多資料後，接著就是需要大量的閱讀，透過閱讀過程去瞭解自己初擬的題目是否有研究價值？是否已經有人研究過而了無新意？或者根本就是個行不通的研究題目？若此時已有點眉目，就可以針對該題目有專精的教授進行約訪，一方面瞭解該题目的可行性，確認是否需要再作修正，一方面也可瞭解該老師是否也有興趣與意願幫助你進行這研究，也就是擔任你的指導教授。

善用各種資料庫與關鍵字查詢是研究生發展論文題目很重要的技術。在進行關鍵字查詢前，首先要完整調查自己學校的圖書館，甚至是全國各大圖書館，哪些有提供與自身研究領域相關的資料庫，因為目前資料庫價格越來越高，許多大學為了節省開銷，都紛紛取消資料庫的訂閱，所以研究生更應該先調查自身研究領域的資料庫的所在，然後才能確實執行關鍵字查詢。

慎選指導教授

如前述，有些研究生喜歡找那種給論文题目的指導教授，從不問自己的興趣何在，只問如何可以快速畢業。對於這類研究生，我個人無法提供甚麼具體勸勉，只能說人生各有所求，就祝他一生順遂。至於那些想把論文寫作當作是取得學位過程的重要學習目的的研究生，我會建議，找一位對自己有興趣題目專精的學者，與其一起教學相長。

通常指導教授可概分為四類，一種是恨不得研究生趕快畢業，因此從研究題目到研究架構，事必躬親，屬裸母型指導教授；一種是不反對研究生趕快畢業，但卻採無為而治的做法，你不找他、他也不會找你，任研究生自行發揮，屬於放牛吃草型指導教授；第三種是來者不拒型，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專長，只要有研究生上門求教，就答應指導，雖然和善熱心偶爾也會提供些意見，不過對研究進行卻無法掌控，研究生本身

「教授沒有開的課」——誰來告訴研究生該如何做研究？

須具備十八般武藝，否則可能很難完成論文，屬於自生自滅型指導教授；最後一種則是嚴選研究生，而且議題非本身專長領域者不收，在過程則不斷提出質疑，但卻樂於與研究生分享研究經驗，屬於嚴苛型指導教授，跟這種指導教授，雖然過程可能較其他研究生曲折，時間也可能拖得較久，但相對可能收穫也會較大。當然也有極少數指導教授屬於研究題目非專長領域但卻對研究生百般刁難；或者屬於大師級但卻無為而治，稍微提點你就收穫滿滿者，但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若碰到就真是你的「運氣」。

第四種是我比較推薦的指導教授類型，不過如果可以碰到總是樂意撥出時間與研究生討論論文，也願意隨時解決研究過程中疑難雜症的指導教授，並且鉅細靡遺協助論文進行的指導教授，我只能說這是你祖上積德，一定要好好珍惜。

總結來說，各類型指導教授都有，但我想提醒的是，當同學們抱怨指導教授這個與那個時，同學們是否也應該先捫心自問——你當初是如何決定指導教授的呢？

學習論文寫作體例

這雖然是個小問題，但根據過去經驗我發現，許多研究生直到寫論文階段，都還不知道何謂論文寫作格式？為何要有論文格式規範？簡單說，各專業領域都有屬於自己的論文報告寫作格式，例如最常見的有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以及MLA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等兩種論文寫作格式。在台灣，傳播領域的中文論文寫作格式，我通常會建議同學採用新聞學研究的徵稿格式，新聞學研究網站上也有附論文寫作格式的說明以供下載，值得研究生好好參考，以作為論文格式書寫的模仿對象。說模仿，是有道理的，因為有時候為何這裡是頓點、那裡卻是冒號，你問我我也不知道，或許有道理，但我也只是依樣畫葫蘆。至於用中文書寫論文的中國大陸，以及英文書寫的香港，到底遵循何種論文寫作格式，我就不得而知了。

至於為何要有論文寫作體例的規範？我個人的理解是，原因之一是可以使論文寫作有個齊一的寫作格式，至少方便閱讀；其次就是希望每篇學術研究成果都可以讓後進研究者在巨人上的肩膀上成長，讀到有興

趣的研究資料，即可方便且快速地透過文獻的檢閱進而找到相關資料，節省學術研究與知識累積的時間與精力。這些解釋是我自己推敲的，正確答案可能要請教那些當初設計論文寫作格式的前輩吧！

切勿抄襲

學位論文的好壞自有客觀評價，除個人後天的努力外，也可能有先天資質的影響，但結果就由自己承擔。無論如何，在寫作過程中，切記所有論文內容都必須是自己親身親為所產製的結果，千萬不要貪圖一時的方便，而任意剽竊他人的研究成果，也就是直接或間接抄襲前人的研究論文內容(例如在A的論文裡抄B的研究成果，若不註明轉引來源，這也是抄襲，屬間接抄襲)。在自己的論文裡寫入他人的研究成果而未註明出處，甚至據為己有作為自己的研究所得，至些都算是抄襲，屬於剽竊他人的智慧財產，都違反著作權法，輕者會喪失好不容易得來的學位，重則還要吃上違反著作權的官司，罰款或坐牢都有可能。如果辛苦好幾年，卻因部分內容抄襲前人著作而失掉學位，實在是得不償失，不可不慎！還有，切記抄襲就是抄襲，千萬不要有抄一小段亦無妨的僥倖心態，萬一被發現，抄一段或抄幾頁其實都是沒差別的，都是抄襲，都是違法的。

筆者在談論這個議題的同時，心情特別沉重，因為日前才剛處理完我曾指導的兩本敝所碩士論文分別遭到台灣兩所大學研究所畢業生抄襲的事宜。這兩本碩士論文都是在作者畢業幾年後因被發現內容出現抄襲而遭舉發，目前這兩位碩士的畢業論文都已經被學校學術委員會判定為抄襲而取消學位。說來無奈，研究所好幾年的苦讀生涯，卻因畢業論文抄襲而遭取消學位，一切努力全成為空幻，實在不值得，但被抄襲者亦需經歷捍衛自己論文著作權的辛苦歷程，也是一種煎熬。所以論文抄襲既不利人也不利己，建議研究生要謹慎面對抄襲問題，套句老話——千萬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以上五點淺見希望可以提供正在與論文苦戰的學子們一些面對困境時的出口，至於是不是全部建議都適用於兩岸各地的研究生，就請各位因地制宜的自行擷取有助益的部分了。

張國良(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院長)

很高興有機會與兩岸三地的學子們探討學術、交流心得。由於三地情況不盡相同，因此，我更多地針對自己比較熟悉的內地(大陸)情況，發表一些感想。

作為一個博士研究生，選擇甚麼論文題目或如何「開題」？這看來是一個比較普遍、也至關重要的問題。對此，導師不難給出原則性的回答：既要有理論意義，又要有實際意義，云云，但對學生恐怕沒多大幫助。這裏，結合我自己的經歷，提幾點具體建議：

一、尋找「缺門」。即尋找前人尚未或甚少涉足的空白領域。事實上，與發達國家和香港、台灣地區相比，內地(大陸)的傳播學研究起步很遲，「缺門」尤多，因此，這可以說是一條相當可行且有效的途徑。

例如，我本人的博士論文以《現代日本大眾傳播史》為題，評述1945年至1990年間日本大眾媒介與社會變遷的互動歷史，由於這是國內首次嘗試，作為評審專家的胡道靜、郭紹烈等著名學者認為，它「言前人所未言」，填補了傳播學與歷史學交叉地帶的一個空白。

又如，在我的指導下，以「議程設置功能」、「知溝」、「涵化」、「第三人效果」(W. Philips Davison)、「新聞解讀模式」(Stuart Hall)等傳播學著名理論為參考框架而撰寫的若干篇博士論文，都屬於內地(大陸)首開先河的相關實證研究，因此，無一例外地獲得評審專家的肯定，認為這些成果富有開拓意義。

關於「開題」，其實很有一些誤解或模糊認識，略作說明如下：1) 論文題目即研究問題從何而來？似乎可以來自實際(社會實踐)，也可以來自理論(前人文獻)，但歸根結底，來自實際——也就是本土各行各業建設的需求。道理很簡單，「理論」本源於「實際」。為甚麼要研討日本的傳播史或參照歐美的各種傳播學理論？決非為研究而研究，也非為趕時髦、裝門面，而是為了獲得對中國的傳播業(以及傳播學)發展有益的經驗和規律；2) 可是，這決不意味著，「實際」高於「理論」，從研究目標看，恰恰相反，應該是「理論」高於「實際」。一方面，來自「實際」的需求中，原本就包括了對「理論」的追求；另一方面，所謂「理論」，無非是事物規律的抽象，比起一般經驗來，它可以更高屋建瓴地指導「實際」。因

此，總體而言，我們既需要對「實際」(傳播業)有直接效益的「應用型」研究，也需要、或更需要(就學界的立場和價值而言)對「理論」(傳播學)有直接貢獻、而對「實際」(傳播業)可能只有間接作用的「基礎型」研究。

二、關注「熱門」。既然我們的研究問題服務於或服從於本土的實際需求，而所謂的「熱門」、「熱點」，通常是對國計民生有較大影響的問題，則予以重視也就可以說是理所當然了。諸如互聯網、愛滋病、弱勢群體、恐怖主義，等等，傳播學界都沒有理由忽視、迴避。但需要注意的是，切勿「跟風」或「一窩蜂」，在大的「熱門」中仍必須尋找小的「缺門」(即自身研究的價值所在)。

以互聯網為例，我指導的幾篇博士論文，分別以《互聯網與公眾表達》、《互聯網與第三人效果》、《互聯網與社會資本(布林迪厄)的關係》為題，既選擇了與眾不同的角度，又連接了實際和理論，在鋪天蓋地的同類研究中，就具有了一定的新意。

三、重視「冷門」。可是，我們的眼光不能只盯著「熱門」，還必須兼顧「冷門」。所謂「冷門」，就是不怎麼被公眾注意的領域或問題，但實際上，其中不乏重要課題。換言之「冷門」更可能是「缺門」，或許，還可能意味著「先見」和「超前」。

例如，我的博士生中，有人就雲南獨龍江地區少數民族與大眾傳播的關係，以民族志方法展開艱苦的研究，取得出色的成果，被認為是國內迄今少有的傳播學定性研究的成功範例；另有人首次以遠源流長、獨樹一幟的英國傳播學理論為物件，進行系統的梳理，也獲得不錯的反響。

在此過程中，如何達成師生之間的良性互動？對導師至少有兩個要求：1) 相容並包的寬廣胸懷。導師不能僅以自己的專長或喜好束縛學生，而應該結合學生的興趣和特長，確定研究題目；2) 中西融合的開闊視野。導師既要熟悉本土「國情」，又要通曉國際「世事」——特別是洞見世界傳播學研究前沿所在。否則，對所謂「缺門」、「熱門」或「冷門」的判斷和選擇，就無從談起了。

綜上所述，一切學術活動的價值和指向，無非是：創新(發現新事實，或提出新觀點，或創造新方法)！沒有創新，就沒有學術，也就沒有

「教授沒有開的課」——誰來告訴研究生該如何做研究？

合格的、更不必說優秀的博士論文了。遺憾的是，從內地（大陸）現狀看，還存在著相當數量的徒具形式、沒有任何創新意義的「博士論文」。

說到這裏，導師及其他教授對博士論文的評判標準也就清楚了，即：有無創新？有多少創新？當然，這是指真正的、即符合學術規範的創新。不過，同樣遺憾（並與上述博士論文的狀況直接相關）的是，目前內地（大陸）的博士生導師隊伍參差不齊，在知識結構、學術視野乃至品格等方面的差異甚大，因此，博士生們在選擇導師或評審專家時，就需要格外謹慎了。

當然，我相信，這只是過渡階段的暫時現象，隨著有關體制、機制、政策、風氣的轉變，一個較為良好的學術環境終將形成。但是，這畢竟又有賴於我們每個當事人的努力——「天上不會掉餡餅下來」。與大家共勉！

馬成龍（香港浸會大學傳播系教授兼系主任）

看了同學的提問後，頗感欣慰。《禮記》中說：「學然後知不足」，這些問題都是認真學習後的深切體認。有位台灣名醫曾對我談起受過正統訓練的醫生和江湖郎中最大的不同是：“We know our limitations.” 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也在一場北京大學的演說中強調：氣功有「大師」，但學術界不應該有所謂的「大師」。也就是說：學無止境，真正鑽研學問的人，通常不會認為自己是「學貫中西」的「大師」。

香港是承襲英國傳統的學制與美國很不相同。美國的傳播學博士生被要求修很多關於研究方法的課，例如，量化、質化方法、測量法（measurement）、統計學、理論建構（theory construction）、批判方法等等。加在一起至少有七、八門之多。同時，一些大的學校分工也非常細微，比如教統計學的老師往往是專門研究社會科學統計分析的統計系教授，而非「半吊子」的本系老師。

但由於傳統的英國「研究型」碩士、博士生不需修課，因而形成了較為緊密的師徒關係。徒弟的選題能力也因為受到缺乏系統訓練的限制而經常需要單一導師的面授機宜，如果導師的研究領域狹隘，學生就可能

變成了名符其實的「徒弟」，跟著打鐵織布，喪失了「自成一家」的機會。

在另一方面，香港各公立大學(包括浸會大學)的「研究型」碩士，博士生名額很少，但都可以領有政府的優厚獎學金(studentship)，豐衣足食，無後顧之憂。由於名額極為有限(通常每年只有個位數的空缺)，專為「研究型」碩士，博士生開的課多是少得可憐。我們傳理學院已規劃一系列的措施來彌補我們先天的不足。

比較特別的是，除了正規課之外，修讀「研究型」課程的研究生每學期都要註冊一門以學生分享為主，老師評論為輔的“Proseminar”。在Proseminar中，除了由學生自己輪流提出研究報告外，每學期都有重點活動。例如，去年上學期的研究方法大辯論，是將所有學生分為三組——量化研究、質化研究、及批判/歷史研究，各組輪番上陣替己方辯護及攻擊其他兩方。去年下學期則有“Philosophy of Science”的四場seminars，也是全體學生參加，談論傳播理論的哲學基礎。學生們普遍認為這些活動產生的學習效果遠勝過課堂聽講。

以上所說的都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在有限的資源下所作的努力，其目的是希望每一位元「研究型」研究生都能成為獨挑大樑的研究人員。

下面來談談我心中的理想研究所中的老師的角色與師生互動的原則：

首先，在「研究型」課程中，指導老師對學生學習扮演著至為重要的角色。其個人視野，知識縱深與監督能力都直接影響學生的論文品質。一位好老師可以讓學生在美鳳提到的「知識、評鑑、思考、研究和寫作」五個方面都保持穩定的成長。不好的老師則完全無法讓學生將潛力發揮出來。因此，老師要時時注意自己知識思維的更新，以免誤人子弟。

其次，研究所老師的角色是「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亦即學生的獨立思考必須發生在老師提供意見之前；老師不宜強行銷售自己的興趣。甚至阻止學生修習自己不喜歡的研究方法，這對學生是極為不公平的，老師總不能因為自己摸到象尾就強迫學生接受大象像鞭子的看法吧。

老師對學生的指導可分為宏觀與微觀兩方面。在宏觀方面，不但要確定學生選的題目具有研究價值，也要檢驗大的思維方向是否正確。在微觀方面，要盡量給予「具體指導」。但是學海無涯，學生不該指望老師萬能。老師更不該「裝懂」，務必要虛心思考學生的提問，倘若有無法解

答的問題，應該老實告訴學生：「我需要時間去找答案」。研究生們不應該把自己定位為「大五」，「大六」生，照單全收老師的意見，也不應該成為一群只會服從老師命令的乖寶寶。他們要知道自己是可以在思想上超越老師，在方法上挑戰老師的。

除了這些，身為老師也不應強調「這些學生考進來的分數都很高」之類的既成事實，反而該問自己「我們能夠和已經給予學生多少東西？」。那種兩岸三地共有的聯考分數症候群不僅邊緣化了不少考低分的學生，也讓很多考高分的學生恃寵而驕，不肯虛心學習。這些傲慢與偏見的結合往往成為學術進步的重大障礙。

談了許多，對於同學所提的問題似乎沒有立即的解決方法，但是這些問題也確實不是容易解決的，它們牽涉到現行制度、資源、師資等許多內外因素。但這種對話總是有益的，它為雙方對各自的角色義務帶來了重新思考和檢討的機會。

張錦華(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我希望同學提出的問題都能在四位老師的回應中找到某種程度的解答。但是，其中有一位同學的問題似乎沒有人直接回應，作為這個對談的主編，我想提供一點想法，以免對談變成獨白。

這是政治大學新聞所博士班的劉忠博提到的問題，他認為研究應該返回自身，把自己當作研究對象，解剖自己的行動，解釋自己的行動意義。他認為一般的研究方法課程都只是研究其他人的動機、其他人的行動、其他人的理論。我們缺少一門研究「自己」的課程。這確實是主流傳播研究中很少談到的課題，但近年已有不同的學者開始探索這個領域。

我想藉由兩個研究實例，來回應如何研究「自己」。其實回顧自己，也可以看到別人；觀看別人時，也可更瞭解自己。第一則正是前述畢恆達教授的論文經驗。他在紐約市立大學讀環境心理學的時候，也正面臨選擇論文題目之苦，每天在房間苦思如何找到自己有興趣、有學術意義、而且還能超越既有的研究的題目？有天突然從自己的房間經驗想到：留學生會帶哪些東西來？為甚麼？於是打電話給樓下的學妹，再打電話問其他的同學。結果，蒐集到各種男、女生的不同理由和物品經

驗。原本討論物品意義的大作已有很多，但是，在認真對待親身經驗中，卻也發現了許多原創的視角和研究領域，例如：原來性別意識的研究大都討論親子關係、學校教育、婚姻家庭等。但他從空間中看到性別的差異，於是開展出獨創的研究貢獻。

另外一個例子，讓我們看到研究別人也是可以研究自己。在《流離尋岸》這本探討台灣「外籍新娘」處境的重要著作中，夏曉鵬在解析一個外在對象「外籍新娘」的過程中，學習到回顧自我生命中的他者/我族的經驗：她的親戚早年風光嫁給美軍，她自己也曾經羨慕洋姐妹的點滴。於是在她這本學術著作中，我們看到了她如何以返回自身體驗與記憶的探索與剖析，來織成觀看和分析外在事件的脈絡。觀看別人，卻看到自己的迷思；凝視自己，才同理了他人的處境。這也是社會學者M. Jackson提出的「激進經驗主義」，它與傳統的經驗主義/客觀主義背道而馳，「唯有從自身經驗開始，我們才能理解他人」(Jackson, 1989；夏曉鵬，2002)。

事實上，女性主義學者們如Dorothy Smith、Sandra Harding和Stanley & Wise 等人已發展出較有系統的女性主義方法論(Harding, 1987; Smith, 1987; Stanley & Wise 1993)。她們基本上認為，由於女性長期受到父權社會和語言知識等各種文化及觀點的限制，女性的實際生活和理論規範出現斷裂，自身經驗遭到異化。女性主義對傳統知識典範與方法論的挑戰，觸動了所有反省他族/我族相對位置的研究意義，並重新對尋找問題意識、選擇研究方法、解釋研究意義、甚至論文的書寫提出另類思考。

因此，劉忠博的提議讓我們有機會討論傳統研究方法和理論觀點的限制，這當然不僅是默識的範疇，而是一個新的研究挑戰，需要的也許不僅是一門瞭解人的行動的理論課程，或是一門質化研究的課程，更是另一種系統知識的典範視野。

証得菩提

這次交流顯示出同學是認真並具有很強的反思能力，而老師則為如何把學生培養成獨立的研究者而坦誠講出他們的經驗和智慧。這次對談不是交流的終結，希望是邁向更深入討論的開始。在結束前，有一本與本主題直接相關的小書值得在此一提，而這本小書也許是這次對談的靈感來源。作者是台灣大學城鄉研究所的知名教授畢恆達，他出過多本性

別與空間名著，也曾指導過一百多篇論文，在這本口袋書《教授為甚麼沒告訴我》(畢恆達，2005)之中，他把累積十數年指導論文和自己的親身經驗，以十分談諧的口吻與讀者分享。歡迎各位在看完這個專題對談後，找來這本被台大社會系曾熾芬教授評為「有趣！有趣！有趣！」的小書一讀。但是請別小看它，這本可以當作研究生寫作論文的「枕邊書」的著作，包括有如何找題目、如何回顧文獻、找搜尋引擎、如何找資料、如何寫書目、如何使用Endnote軟體、甚至如何閱讀書籍的版權頁等各種實際有用的知識。而且，它居然登上了誠品書店的暢銷書排行榜！

在這本書的序言中，畢恆達和我們分享了他寫作論文的痛苦經驗：

「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家裡的馬桶刷得特別乾淨。原來每天坐在電腦前面，卻經常連一個字也寫不出來，於是就猛刷馬桶、擦地板。心中即使煩躁，卻也不敢外出看電影、逛街，這樣會有罪惡感，只好做些像是刷馬桶這種具有正當性的工作，其實是在逃避，只要找到能夠不要寫論文的理由就好。而我其他也在寫論文的同學，則有的打毛線、有的畫畫、有的學打坐，似乎論文遇到瓶頸，每個人就會自然發展出第二專長。

……然而指導教授因脫離學生年代久遠，無法體會學生的痛處；坊間雖然不缺研究方法的書籍，但是大都講些應然的大原則，無法回答研究生涯的具體處境。這本書，野心不太，但願能夠成為研究生撰寫論文的枕邊書，讓研究生在寫作的痛苦深淵中還能安然入睡。」

原來寫作論文的經驗，是普天之下，從古至今，大同小異的。不過，若無苦惱便無菩提，這個專題是與傳播研究界的師生們共同回應這個苦惱，是不是能夠証得菩提，那就還是要修行在個人了。

參考文獻

- 夏曉鵬(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灣社會研究叢刊，第9期。
- 畢恆達(2005)。《教授為甚麼沒告訴我》。台北：學富。
- 羅世宏(2005)。〈研究創意·開放源碼〉。《傳播研究簡訊》，第42期，頁5-7。

- Han, B. & Gendelman, I. (2007). How to become a professor: Faculty perceptions of Communication PH.D. student characteristics needed to succeed in academi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ewsletter*, 35 (2), 16–19.
- Harding, S. (1987).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Jackson, M. (1989). *Paths toward a Clearing: Radical Empiricism and Ethnographic Inquir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D. E.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Boston, 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tanley, L. & S. Wise (1993). *Breaking out again: Feminist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New York: Routledge.